

毛泽东怎样教育子女读书

□ 李合敏

子女的读书内容要有所选择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对读书问题更具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青少年，处在“修学储能”的阶段，更应当认真读书学习，掌握真才实学。否则，“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子女的读书教育。

子女的读书内容必须广博

毛泽东在给子女的信中不仅屡屡提及“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足，不如你们专门学习的时候”，“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勉励他们趁年纪尚轻，专心学习，刻苦读书，而且要求他们读书的内容也十分宽泛，涉及自然科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地理、古典文学、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笔记小说、诗歌等。

1954年7月，他致信女儿李敏、李讷，建议她们读《古诗选本》：“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1959年8月，他致信大儿媳刘思齐，建议她“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毛泽东曾先后两次给他们购置并寄送书籍。1939年8月，他致信毛岸英、毛岸青，“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批书在寄送过程中丢失。毛泽东遂又购置了一批，并于1941年1月致信两个儿子：“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他还随信附上了这批书的详细书目及册数：“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醉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毛泽东要求子女读书内容的广博性，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深知，人的学习追求固然必须学无止境，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读完。因而，读书也应当有所侧重，尤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书内容更应有所选择。

在谈及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识的经历时，他说，自己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的5年（1913—1918年）中，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而只想专修社会科学。然而，进一步的学习使他深感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也难以深入学习社会科学，从而开始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吸取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1940年初，他进一步指出，“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在校学习的青少年更要努力学习好自然科学。因为只有具备坚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功底，才能学好社会科学，也才能为参与社会实践、建设新中国奠定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1941年初致信毛岸英、毛岸青告诫他们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此外，毛泽东认为鉴古可以知今，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他在1939年5月曾指出，“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毛泽东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历史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有造诣，而且教育子女们也要努力学习历史。他在1941年给毛岸英、毛岸青所寄的书籍中，就有《三国志》《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历史教程》等历史书籍。1947年9月，他在给毛岸英的信中专门提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努力学习历史，而小女儿李讷更干脆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门学习历史。

子女的读书要有基本方法

在教育子女们刻苦读书的同时，毛泽东十分注意为他们指出基本的学习方法。

其一，由浅入深，锲而不舍，不断积累。李讷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不仅要认真学习课内必读书籍，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一些大部头的历史著作，这就难免感到压力巨大。毛泽东知悉后，于1959年12月专门致信李讷：“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1963年1月，他再次告诫李讷“读浅，不急”。就是说，读书学习要由浅入深，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积累，才能收到厚积薄发的效果。这是做学问的最好途径，也是做好学问的基本规律。

其二，要善于思考，而不要死读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毛泽东历来提倡读书学习必须独立思考，消理解解，而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只是机械地背诵教科书。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掌握真才实学，增强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他要求学生“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对于子女，他教育他们“不要急，知识需要积累，最重要的是要把书读活，切忌读死书，死读书，要勤动脑，要善于思考”。当女儿媳邵华告诉他自己的《中国通史》取得了高分时，他当即要邵华解释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虽然回答得有条有理，但均是教科书上提到的，而没有融入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借机对其指点：“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要多读史料，多思考，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事隔多年，李讷在忆及父亲教她读书的情景时，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不喜欢那种死记硬背呀，读死书呀，这些他不喜欢。”

其三，重视孩子的社会实践。1946年春，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在父子久别重逢的情形下，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让毛岸英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他对毛岸英说：“你在苏联长大，在苏联大学读书，读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就是劳动大学。过些时候，我给你找个校长，上劳动大学去。”不久，他便给毛岸英找来了“校长”——边区劳模吴满有。临行前，他教导毛岸英：“你要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要从开荒干起，一直到收获。这样你就会有切身感受到的艰辛，懂得劳动人民的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先后安排没有农村劳动经历的大女婿孔令华和李讷分别到北京郊区黄土岗公社、井冈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

（摘自2019年第1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毛泽东是怎样教育和要求子女的》）

1982年邓颖超先后写了两份遗嘱，将自己的后事和遗物作了安排，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和高风亮节。

第一份遗嘱写于1982年6月17日，是在1978年7月1日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础上重抄并作了补充。遗嘱在邓颖超逝世后，于1992年7月12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主要内容为：一、遗体解剖后火化；二、骨灰不保留，撒掉；三、不搞遗体告别；四、不开追悼会；五、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恩来共住房舍为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六、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勿以因周恩来的关系或对周恩来的感情出发，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纪律给予照顾安排；七、公布以上要求，作为其已逝世的消息。

邓颖超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她以自己“从未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的远房侄子为例，特意在遗嘱中提及要正确对待自己和周恩来的后辈及亲属，以端正党风；并表示“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也是她“坚决支持的”。此外，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邓颖超面对生死也非常豁达，为了不

给组织添麻烦，她要求自己的后事从简，反对大办丧事和在家吊唁。

第二份遗嘱写于1982年11月5日，她委托身边工作人员组成小组，负责处理她的遗物。主要内容有：一、在其患病无救时不采取抢救；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三、和周恩来共住的房子交公处理；四、中办发周恩来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退还原机关，其他图书出版物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五、个人文件、来往通讯、文书类文件、讲话、谈话录音、其与周恩来的所有照片，均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储清理酌处；六、可交公的遗物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七、个人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遗嘱除再次强调房子交公处理外，邓颖超将个人所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物的处理都作了细致安排。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既是她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又是一面映照个人品行的镜子，诠释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终身奉献给党和国家的高尚品格和人生境界。

（摘自2018年11月21日《党史信息报》）

赵尚志“冰趟子”伏击破敌

□ 果学军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赵尚志领导东北抗联第三军英勇战斗，抗日游击区域不断发展和扩大，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和不安，调集重兵进行“讨伐”。1937年3月初，赵尚志率部队到达黑龙江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里，得到报告说：日伪军数百人尾随而来。赵尚志立即决定设伏予以痛击。他一面集合部队连夜火速向通北东山中转移，一面命令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伏；又命20余名战士与敌接触，诱敌进入伏击圈，经两个小时激战，消灭敌人30余人。

取得胜利后，赵尚志正确判断敌人一定会调来大批军队再次反扑，于是迅速率领部队前进。不久，部队来到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这里是通北县城从西向东进入山沟里的必经之路，坡上的山路旁，有4座大木营，每个屋子能住一二百人，是来往山里的车马店。在木营附近，有常年流淌的山泉，冬天泉水从山

上流下来，在山路北面形成一大片高低不平的冰面，冰面上还有积雪，因此更加光滑，因此当地人称之为“冰趟子”。

赵尚志仔细观察了“冰趟子”周围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一场阻击战，消灭跟踪追来的敌人。他派100多人埋伏在半山腰；200多人布置在东面山上，担任正面阻击；另派100多人隐蔽在东南边山上，防备敌人迂回包抄。赵尚志将指挥部设在“冰趟子”东北角的小山上，通过传令兵打旗语指挥战斗。

随后，部队按照军长赵尚志的命令，在有利地形上，两天之内筑好阵地，他们还在阵地前浇上水，水结冰后，就可以阻止敌人的快速行进。此外战士们还在各个阵地之间以及阵地和木营之间用雪堆砌成战壕，并在木营的墙上挖了一排射击孔。

1937年3月7日，日伪军800余人进入“冰趟子”，战斗随即打响。敌人虽然人数占优，武器先进，但由于是踩在冰面上，行走不稳，在抗联战士们的打击下，顿时队形大乱，只好趴在冰

面上的蒿草丛里不敢移动。有20余人好不容易爬上木营，但没有后续援军，很快被歼灭。由于敌人的背包上全裹着一块黄白色的豹子皮（休息时坐在地上防冷用），一下子成了显眼的目标。抗联战士们居高临下，瞄准豹子皮射击，打得敌人死伤惨重。敌人不断增兵，连攻三次，但毫无效果，反而死伤惨重。随着天越来越黑，气温骤降，不少趴在地上的敌人被冻得浑身麻木。而抗联战士们则分成几组，一部分在阵地上射杀敌人，另一部分则换下进入木营里烤火、吃饭。战斗到天黑，活着的敌人才敢爬起来往回跑。赵尚志命战士们迅速打扫战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给养，然后果断决定撤出战场。这次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有利地形，采取巧妙的伏击战术，共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其中被击毙者200余人（其中包括7名指挥官），成为东北抗联部队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摘自2019年11月14日《人民政协报》）

我们在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险的时候要居安思危，革命到底。要以我们的骨友同万众一心，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长城是祖国国魂所系，也是您的英灵所在。您先走了，我将来也要与您与长城同在。

子女和孙儿们都会理解我们的……您的老伴和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们都将继承您的遗志。

学习敬爱的周总理的典范，代代相传。这是可以告慰于你的。

永别了，希健！您安息吧，您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青长哀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一名丈夫对妻子的理解、深情与眷恋，至今读来仍然让人荡气回肠、泪流满襟。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永远与长城同在，永远与祖国同在。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摘自2018年第12期《党史纵览》）

父亲罗青长和母亲杜希健的红色爱情

□ 罗 援

2018年9月17日，是家父罗青长100周年诞辰，本想和常人一样写一些文字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怀念，但因为家父从事的是特殊工作，我们做子女的除了媒体上披露的一些情况之外，对父亲从事的工作确实知之甚少。但有一件事，使我至今刻骨铭心，难以忘怀，那就是父亲与母亲感人至深的革命爱情。

现在一些年轻人会感到疑惑，革命是轰轰烈烈的亢奋，爱情是柔情绕指的缠绵，这两者怎么能结合到一起呢？但在我们父辈的那个年代，革命与爱情确实实实在在地结合在一起。

我所认识的许多伯伯伯母、叔叔阿姨，有些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有些是英雄相慕，刚柔互补；有些是性格迥异，搭伴为生；有些是组织拉配，日后生情……但他们都相濡以沫，度过了他们那一代人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什么使他们结合到一起？革命，这个具有磁石般的理想信念，吸引着全中国来自各个阶层、来自天南地北的热血青年，让他们都聚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我的父母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走到了一起的。

父亲罗青长，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奶奶为了让这个罗家的长子长孙日后有出息，省

吃俭用，把他送入了私塾。父亲凭着自己的勤奋，以全县第二名考入了苍溪中学。在学校，由于受到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引导，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1934年红军来到我的老家，父亲与23名小伙伴一起加入了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到达延安后，父亲被选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留校当了教员。后又经党组织选拔，他进入第一期枣园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被派往西安国统区，先是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中共代表林伯渠的机要秘书兼办事处党支部书记，而后转入地下，进入吴德峰情报系统，以国民党三十八军中尉书记员的身份为掩护，负责联络并业务指导该系统的重要情报人员，其中就有后来被周恩来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我的母亲杜希健，出生于河南省

扶沟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38年受其哥哥杜希唐的影响加入革命队伍。后随彭雪枫学校转移至延安，进入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搭乘护送周恩来去西安的卡车，进入国统区，也到了吴德峰情报系统当报务员，这样，父亲便成为母亲的直接领导者。

就这样，机缘巧合，我的父母走到了一起。而让他们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红线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艰苦又危险。惊险的敌后斗争，使我的父母相互信任，相互依托，渐渐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1940年的双十节，日军的飞机飞临西安上空，造成全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此时，父亲罗青长却担心秘密电台的安危，他与民众逆向而行，赶往秘密电台所在地。当他赶到秘密地点时，看到20岁的杜希健正神情自若地守候在电台旁边。父亲当时非常

激动也非常高兴，他对母亲平时的欣赏与爱慕顿时升华为革命的爱情。也就是在这一声声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罗青长向杜希健倾吐了心声。

后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罗青长和杜希健这对红色特工结成了终身伴侣。在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时，没有鲜花，没有美酒，窗外只有北风的呼啸声，还有刺耳的警笛声。当时来参加婚礼的，只有和罗青长保持单线联系的地下交通员陶斯咏与他的女儿一阶。

以后，父母的工作从地下转到了地上，由战争年代转到了和平年代，但永远不变的是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

有一次，父亲到国外执行任务，意外发生车祸。获此消息，母亲的心始终悬着，挂念不已。父亲回国的那一天，母亲跑到机场迎接，当她看见丈夫胳膊吊着绷带走下飞机后，她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才松弛下来。而这次

惊吓让她几天高烧不退，时常在昏迷中呼唤父亲的名字。

父母一路走来，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濡以沫，携手前行，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1991年，母亲因久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母亲的离去使父亲悲痛欲绝，导致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中，父亲流着泪给母亲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告别词，我把它摘录如下，作为他们革命爱情的写照：

希健，您离开我们走了。您生前忧党忧国忧民，我们常议及我俩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坚信我们一生追求的事业必胜必成。

您多次谈到对儿女、孙子、孙女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和睦感到满意……

遵照您生前相约，您的骨灰，我们撒在长城，以遂您的遗愿。您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您又随着国歌声飘然而去。

邓颖超的两份遗嘱

□ 刘 颖

